

# “人口两三万,投出七万票”乱象亟须刹车

□□ 侯馨远



通过组织网络投票调查群众满意度,体现了对群众意见的重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至上”的施政理念,初衷是好的。但票数上去了,就能证明群众满意吗? 实践表明,这样的考核手段因为投票规则设置不合理、过于依赖数据结果等缺陷,不够有效,流于表面。

群众满意度调查每季度一次,各乡镇按票数排名,落后乡镇的主要领导会被约谈;以APP下载数量和投票多少,作为衡量一个地方是否安全的重要指标……据《半月谈》报道,当前一些地方通过网络投票考核基层工作,各式各样的投票让基层干部苦不堪言,乃至出现了公款买票、刷票等乱象。有的乡镇更是用力过猛,人口两三万,投出七万票……“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令人咂舌。

通过网络投票调查群众满意度,体现了对群众意见的重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至上”的施政理念,初衷是好的。但票数上去了,就能证明群众满意吗? 实践表明,这样的考核手段因为投票规则设置不合理、过于依赖数据结果等缺陷,不够有效,流于表面。但囿于考核压力,基层干部仍旧明知是形式主义而为之,淳朴的群众还是把手机交给干部,“帮他们完成个任务”。可这般大费周章、“全民动员”、轰轰烈烈,不过是练就了花拳绣腿、粉饰了表面文章,到最后群众意见没有了解到,具体工作也不知如何改进。基层干部白费了心神时间,地方财政变成了刷票资金,既造成资源浪费,又挤占了本应用来优民生促发展的精力和钱财,令人扼腕叹息。

长远来看,这种造成基层“空耗”的形式主义,还容易透支群众对基层工作的信任,极易引起群众反感。往小了说,群众会对基层干部产生作风不实的印象,当干部真想解决问题、办好实事时,就可能得不到群众理解与支持,导致工作难以开展。往大了说,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基层干部精力有限,如果都被投票、刷票占去了,给群众办办事的精力就少了。因此,防范和警惕形式主义这根弦,什么时候都松不得。

说回“人口两三万,投出七万票”的怪象,问题的确表现在基层,但造成问题的根源却在上级管理部门的考核制度。让基层组织频次密集、范围广大的网络投票,来考核其工作实绩,是否确有必要,会不会给基层干部和群众增加负担? 考核规则是否合

理,有没有技术漏洞或导向偏差,误导基层空耗精力? 考核结果能不能真实反映民意,能对基层工作起多大督促和推动作用? 上级部门在做决策之前,应对这些问题有所考量,按照基层实际做好研判,而不是拍脑袋决策。在制度实施时,应及时跟进情况,听取基层反馈,而不是简单地搞“命令主义”,刻板强硬执行,忽视存在的问题,以好看数据为“工作勤勉”与“成绩斐然”背书。

近年来,受益于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基层工作效率提高,群众办事更便捷,老百姓更有获得感。同时,对形式主义的整治也取得实效,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能卸下重负、轻装上阵,把更多精力用在服务群众、真抓实干上。然而,此类网络投票乱象反映出的问题警醒我们,形式主义仍具有顽固

性、多样性与变异性,容易依附在新技术、新工作上,“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死灰复燃。

因此,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都应首先在思想和认识层面,拧紧反对形式主义这根弦。既解决老问题,也察觉新问题,拿出久久为功、常抓不懈的韧劲。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不仅要避免给基层一味施压、层层加码,而且要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多做经得起实践、时间和人民检验的实事,不怠政、不折腾,形成“头雁效应”。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要学懂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真义,带着初心、问题、任务多下基层,问需于农、问计于农、问效于农。

特别针对依托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所表现出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新问题,要通过完善科学决策流程、预先研判风险、合理设置评价标准、强化问题纠偏机制等方式,有效预防、及时纠正问题。还应认识到,冷冰冰的机器与数据替代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沟通。多到实地看一看,多与群众聊一聊,看看老百姓有没有笑脸,如此得出的判断更有真实质感,或许比费劲半天收集到的网络数据更可信有用。绝不能让网络刷票把民意民心“刷没了”,也不能因为有数据“多跑腿”,干部就不跑腿了。

## 请给基层考核再“瘦瘦身”

□□ 胡泊

减轻基层负担,应切实改善对基层的考核评价机制。不可否认,作为了解基层工作开展情况的方式,严格的考核评价确实能及时发现问题、乱作为、慢作为等问题,也会督促基层单位集中力量做好工作。然而,过于频繁的检查考核,以及越来越精细化的检查考核清单,也给基层单位带来了沉重负担。过度检查考核既分散了基层干部的精力,还可能迫使基层出现“下有对策”的应付主义,产生因压力传导导致的工作执行扭曲。

近年来,各地都在贯彻落实“为基层减负”的中央精神,也取得了减负增效的成果,为基层营造了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但也应该看到,对基层的检查考核仍有不小“瘦身”空间。这也是上级部门结合基层实际改进工作、常态化整治形式主义的应有之义。

为检查考核“瘦身”,一方面要精简各种考核指标,减少频繁的检查考核次数,直接减少基层单位的迎检压力,让被检查、考核的基层单位能投入更多精力做好实际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为检查考核“瘦身”,并非仅仅要“减负”,更应注重“增效”。虽然指标与频次减少了,但检查考核的质量不能降低,还要不断提升。无论检查考核如何“瘦身”,上级部门都要增强对基层的督促和指导意识,及时转变“上压下”“走过即落实”等错误观念,而是要到基层多走走、多倾听,实打实地指导基层干部开展工作,帮助基层干部解决问题。如此,才能真正达到通过减负促进基层能干事、干成事的目的。



作者：朱慧卿

为提高工作APP点击率和官方微博活跃度,给基层下指标、搞摊派;在某些网络问政平台上,对群众反映的个性问题,回复统一而“官方”……据媒体报道,当前一些地方在开展工作时,滋生出“数字形式主义”,既增加了基层负担,又造成了资源浪费,还损害了干群关系。

与传统形式主义相比,“数字形式主义”更隐蔽,表现形式多样。但不难看出,其本质还是忽视实际、脱离群众,其背后是政绩观的错位和作风的不严实。应该看到,用好“数字化”“电子化”工具,必须“脱虚向实”,时刻牢记踏实服务群众才是根本目的,群众满不满意才是考评标准。

这正是:

热度靠刷玩虚活,基层犯愁群众怨。  
形式主义要不得,脱虚向实是关键。

文@向北风

## 农村“人情债”,该说再见了!

□□ 杨瑞雪



今年春节笔者返乡了解到,人情礼金不仅给村民造成经济和心理负担,也成为村里不少矛盾纠纷的导火索。一些农村地区礼金往来次数或金额不对等、没有按情分随礼、被迫跟风随礼等不良现象较多,种种“不好明说”的不满积压下来,为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埋下隐患。

在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中,人情攀比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越来越贵的人情往来让一些农民背上了沉重的人情债。据有关报道,2019年,很多农民的人情礼金支出仅次于食品消费,已成为第二大支出,超过看病支出。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取得了一定成效,而一些地方农村人情攀比却抓一抓好一阵,放一放又反弹。这是因为,农村人情礼金是历史文化交织的产物,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我们的传统文化讲究礼尚往来,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村民家里有婚嫁喜事,左邻右舍都会赶来帮忙,大家一起“凑份子”“随份子”,送点碗筷、脸盆、暖水瓶等日用品,就把大事办了,这是邻里间的守望相助,充满着浓浓的关怀与情意。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村生活条件普遍改善,婚嫁

喜事不再需要亲邻间实物上的添补,人情交往延续过往的礼俗就变成赠送礼金的形式。与此同时,农村社会也逐步由封闭静态走向开放流动,传统朴素的价值观念受到很大冲击,人情往来的礼金标准不断增加,收送礼金的范围不断扩展,乔迁新居、孩子满月升学等名目繁多的人情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礼金日渐背离互助友爱的初衷,人情债就此产生。

历史的产物,终究要走向历史。2020年,我们如期完成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历史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两不愁三保障”的全面实现,让过去的贫困户都基本能够独立应对家庭大事,可以说基于互相帮衬“凑份子”的人情礼金,已经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存在的现实基础。具体而言,笔者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人情礼金的情感传递功能已弱化。相较于以前的“以物救急”,现在的人情礼金“明码标价”,甚至还要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保持有来有往、进退平衡,更像一种复杂的“游戏”,其情感传递的功能已经大打折扣。情义无价,就在于它没有价格,情感功能不应和钱的多少挂钩。当“情”逐渐淡化,“礼金”却不断增长,甚至恶化为“债”的程度,人情礼金存在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就要重新考量了。

二是人情礼金的社交投资功能变了味道。受限于传统乡土社会的封闭、交通联络工具的落后,农民需要通过互助来度过人生的大情小事,村民往往遵循着人情秩序中“有礼必

随”的原则,人情礼金不仅承担着维系社交关系,更承担着进行隐性社交投资的重要功能。“人情人情,在人情愿”,可现在很多时候,村民随礼并不是因为感情到位,而是考虑到低头不见抬头见,面子上要过得去。这样不仅没有带来情感的加深,还会人为地增加矛盾。

三是人情礼金的价值评价功能已被稀释。过去农村婚嫁喜事中,人情礼金、摆酒席的数量,有多少人前来帮忙,是对村民人际关系、社会地位等“面子”的综合评价。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不同利益群体对“面子”也有了不同评价标准,“面子”的指向更多元。比起过去传统气派阔绰的“人情宴”,有人觉得孩子考上大学更有“面子”,有人觉得在城里落户更有“面子”,人情礼金的价值评价功能也被稀释了。

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已经有农民开始自发地放弃所谓的“人情面子”。在笔者老家,去年就有两户农民,在村“两委”没有事前干预的情况下,主动不收取村民的人情礼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股新风让我们看到,人情债正在当前农村逐渐消解的端倪。笔者以为,各地应树立更强的决心、采取更大的力度,更广泛地推进移风易俗,减轻村民的人情债负担。

要进一步加强县乡村联动的治理体系。乡村治理是一项外部性很强的工作,化解人情债也是如此。由于村民“身陷其中”,仅通过村庄内部力量解决问题存在难度。因此,要进一

步加强县乡村联动的治理体系,强化县乡村各级党组织的联动。在县级层面营造整治人情异化的氛围,在乡镇层面面对普遍治理问题定调子、出方案,在村级层面根据实际情况细化标准、落实责任,上下同频,拧成一股绳,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好。

要进一步发挥农村基层组织自治力量。在党委政府领导下,要进一步发挥农村基层组织自治力量,如通过村民自治制定村规民约,引导农民破除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同时,要建立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定出标准、明确规范,为村民提供专业化社会服务,在村庄中形成“大家都一样,少花钱也不丢面子”的普遍共识,让文明新乡风具有坚实配套保障。

要进一步做好群众工作。解决农村人情攀比问题属于“里子工程”,需要下真功夫、久久为功才能见实效,尤其要注意方式方法,“一刀切”的粗暴治理只会把农民群众推到对立面。我们要治理的是高价人情、攀比浪费等不良风气,而不是限制或取消正常的人情往来。很多地方提倡“婚嫁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事不办”,并将人情范围限于核心亲属,受到了广泛认可。农民既是人情债的受害者,也是参与者。如果能紧密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多做正向引导、正面宣传,把道理实实在讲清楚,把利害清清楚楚说明白,相信治理人情攀比的移风易俗工作会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



近日,笔者在调研中听闻河北涿鹿县一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领着村“两委”班子成员四处寻求专业人员为村庄发展做规划,甚至准备跑到北京一些高校门口发传单、求支

招,很受触动。这件事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基层干部对于乡村振兴,规划先行的意识不仅有了,还很急迫,这是好事儿;但另一方面也凸显出现今乡村规划市场上甲乙双方的对接错位问题亟待破解。

当前,抓住乡村振兴“风口”,让自己的村庄“飞”起来,已成为不少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共识。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再次强调科学推进乡村规划,要“先规划后建设,加强分类指导”。作为乡村建设的第一步,规划确实至关重要。规划做得好,如同为乡村振兴打好提纲,心中有数下笔才能有神。

但编好规划、用好规划,却不是一两句话的事儿。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不少地方乡村建设开展火热,千方百计邀请名校、名师团队出谋划策,设计的规划版本不少,可真正能带动乡村全面发展的案例还不多。症结何在?

有的是因为“水土不服”。不看南北差异,不分平原山区,不辨城乡之别,简单机械地把江南水乡模式复制到黄土高原,把城市小区模板粘贴到乡镇村庄,结果造成“四不像”,花了冤枉钱,闹了大笑话。比如有的村庄,本身交通不便,接待能力有限,竟投入十几亿元打造美食村,红墙碧瓦、水榭楼台,旅游旺季时门可罗雀。如此规划,岂不是竹篮打水?

有的是属于“消化不良”。为了规划而规划,只看重文本是否漂亮、模型是否炫酷,不因材施教,没对接需求,这样的规划只能停留在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比如有的村庄没多少集体经济收入,村民消费能力不强,却规划了中心广场、花园草坪、购物中心、歌舞厅等。如此设计,岂不是空中楼阁?

乡村规划如果都是这样不管农民需不需要,不顾村情适不适合,只重形式、照猫画虎、盲目投入,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更是对资金的浪费、对资源的破坏。可见,用好规划的前提是规划要好用。而好用的标准,无外乎既要切合实际,也要经济实用。

一则必须接地气。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尊重当地的地理历史、人文风貌,综合考虑群众需求,这样编制出的规划才能对胃口、好消化,既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还能给乡村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一则应该低成本。所谓“富规划,穷建设”,村庄条件千差万别,先天家底不一样,对于在我国占大多数的既不属于资源集聚型、也够不上特色保护类的普通村庄来说,“全大户型”“堆盆景”式的建设模式,学不了也不节约。应该遵循“有多少米煮多少饭”的原则,尽量靠山取土、就地取材,简单实用才是最高追求。

“水土不服”“消化不良”,都是病,病根儿主要出在甲方思想认识偏差和乙方专业能力不足。要治病,就得对症下药治本拔根。

甲方认识偏差要及时纠正。虽说规划讲究一村一策,但也要避免盲目设计、各自为战,导致同质竞争陷入“内卷”。一般而言,一个乡镇内的村子自然地理环境相似,经济文化特征类似,以乡镇为单元编制村庄规划才更科学。再说,制定村庄规划必须以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为依据。近些年村庄面貌变化巨大,空心村、凋敝村增多,可以预见未来这些居民点和村落还将自然集聚,再让他们单独编制规划显然不划算。哪些优先发展,哪些边干边看,正需要乡镇一级根据辖区内不同家底的村庄统筹规划,把钱花在刀刃上,达到最优性价比。

乙方供给不足要尽快补齐。长期以来,我国乡村规划理论基础薄弱,专门人才缺乏,从业人员大多从城市规划“转岗”而来,所受培训也多是西方国家的一套,对中国乡土民情多不熟悉。这就导致甲方在市场上转圈圈,很难牵手到合适的乙方。除了教育培训要跟上,可以动员从事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有志于奉献乡村的退休干部、能人乡贤下乡返乡,志愿支持乡村规划建设。有的地方通过购买专业服务的方式,招聘一批热爱乡村、了解乡土的专业规划设计人才,为每个乡镇配备一名乡村规划师,正是一招好棋。

此外,还有一个常见误区要规避,不能总以为编制规划是专家、干部的事,忽视农民在规划设计和落地中的存在感。家园怎么建,农民最有发言权。就像城里人装修房子,业主主人即使不是专业设计师,照样装得很好,就是因为装修师傅对业主需求充分了解。村庄是农民常年生产生活的场所,大到产业规划、村容改造,小到房前屋后种什么花、铺什么管,如何设计更方便舒适,他们心里最有谱。过去村庄选址、住宅布局、田园设置都由农民自行完成,其中蕴含的人文生态理念到现在也不过时,这些传统智慧不仅不能丢,更应充分借鉴。再说,将农民撇在一边,做出来的规划得不到他们认同,实施起来难免“硬着陆”,蓝图再美也只能是“蓝图”。

规划失误是最大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忌讳。乡村规划的PPT可以多次修改,乡村建设却经不起反复涂抹。唯有尊重科学,多方发力,让好用的乡村规划供给越来越充足,让农民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才能让美好的振兴蓝图在广袤乡村照进现实。



更多三农评论,敬请关注农民日报社评论部微信公众号:重农评。